

中國現代哲學史

資料汇编



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三集 第一册）

抗日时期哲学思想 战线上的斗争

主 编 钟 离 蒙 杨 凤 麟

一九八二年四月 沈 阳

第三集 说明

本集收集了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哲学战线斗争的资料。分五册付印。

第一册：抗日时期哲学思想战线上的斗争

第二册：力行哲学批判

第三册：战国策派法西斯主义批判

第四册：复古派批判

第五册：新心学批判

目

录

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	逻辑(李维汉)(1)
论敌人后方文化工作·····	梓年(6)
目前文化工作的具体内容·····	潘梓年(11)
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	潘梓年(15)
发挥“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精神·····	梓年(20)
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新文化运动·····	梓年(22)
什么是文化·····	胡绳(26)
什么是世界文化的危机·····	沈友谷(胡绳)(30)
如何接受文化遗产·····	编者(艾思奇)(38)
创造民族的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	吕振羽(40)
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学术运动·····	侯外庐(64)
一年来的中国哲学界·····	无邪(75)
文化工作者应努力的是什么?·····	《群众》周刊社社论(79)

这就算是批评么?·····	沈友谷(80)
民族解放和哲学·····	艾思奇(87)
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	艾思奇(89)
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	艾思奇(94)
反对主观主义·····	艾思奇(112)
关于唯物论的几段杂记·····	艾思奇(115)
怎样学习哲学?·····	徐特立(120)
两种学习方法·····	吴亮平(134)
陶希圣的《论道集》批判·····	陈家康(135)
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	陈家康(142)
抗战时期的哲学研究·····	沈于田(150)
目的论与不可知论批判·····	葛名中(153)
中国哲学史的阶段性及其根本特征·····	向林冰(166)
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实验主义的歪曲·····	殷筱芷(175)

文化运动纲领·····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通过(187)
抗战建国文化的建立发端·····	张申府(191)
战时哲学的必要·····	张申府(194)
物质建设现代化与思想道德现代化·····	贺麟(197)
战时我国文化之动向·····	王云五(201)
儒家学说与抗战精神·····	陈顾远(2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叶青(217)

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

罗 迈

陕甘宁边区，从去年十月十一日开始举行文化教育工作大会（简称文教大会），大会共进行三十七天，参与大会的代表一共有四百五十多人，这其中大部分是从人民当中生长起来的工农兵代表，也有著名的医生、学者、作家、诗人、画家和蒙回民族的代表，共同讨论新民主主义的群众文化运动，主要的内容是：卫生、教育、艺术、报纸四部门。罗迈同志的这篇文章，便是这次大会的总结报告提纲。至于大会的过程和它的成果，本刊拟另写专文介绍。

（一）边区文教的总任务

边区文化，有其进步的和落后的两个方面：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其进步方面；封建文化残余，是其落后方面。边区人民从政治上、经济上破坏了封建统治；反映政治经济的文化生活，也应破坏这种统治。从领导方向与新文教工作的政治地位看，文化上这种旧统治也已经破坏了；从边区的军队、工厂、公立学校和许多群众组织来说，这种旧文化的统治也已经基本上结束了；从农民的观念形态的最主要方面看，封建的束缚也已经被打破了。但从多数农民的文化活动的广大领域看，则封建文化的残余，还是存在着；并在某些领域，如卫生上与艺术上，暂时还占着优势，与边区的政治经济生活相反而不相称。因此，从旧到新，破坏封建文化残余，为新民主文化打开广阔发展的道路，使之正当地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生活，仍是边区文教工作的重要历史任务，需要付以巨大的努力，才能成功。

与破坏封建半封建的政治和经济同时，边区人民即建立了新民主的政治和经济。这个建设，在近几年来，尤其长足的进步（抗日与民主、民选政府与三三制、合作社与变工队、工厂与作坊等等）。可是另一方面，由于封建文化的破坏不彻底与新民主文化的发展不足，在边区人民的前进道路上还横着巨大的绊脚石：若干地区成人百分之三与婴孩百分之八十的死亡率（还有在生产上居重要地位的牲畜的死亡率也很大的），百分之九十的文盲与迷信，严重妨害了他们政治经济生活的继续发展。因此，边区人民迫切需要生理上（卫生）与心理上（教育）的解放，也就是说，要卫生运动与教育运动（报纸和文艺也都是教育的形式）。从无到有，从极少数人到大多数人，使文化生活适应于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使政治经济的发展获得完全的解放。

因此，边区群众文教工作的当前任务，是开展卫生、教育、报纸、文艺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生产第一与继续发展生产的基础之上，五年至十年之内，消灭百分之三与百分之六十的死亡率，大大增加人口繁殖率，消灭男子四十岁与女子三十五岁以下的文盲，大家能读能写，健康愉快，享有新文化生活，从而有充分能力向前发展政治经济。

因此，应该重视文教工作与文教运动。过去不重视的，应该转到重视。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一致奋斗。

(二) 新的时期开始了

边区文教工作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现在开始进入第三个时期。

内战暴风雨时期：人民把教育权夺到自己手里，为革命事业服务。文艺方面，除各种剧团外，革命歌曲普遍流行，报纸也能反映群众的战斗生活。这时的文教工作，虽是比较粗糙与简略的（受当时环境的限制），但由于密切联系了群众和实际，对革命事业起了鼓舞群众意志与动员群众行动的积极作用，新鲜活泼，又健壮有力。

抗战后，至一九四三年：边区因尚未遭敌人蹂躏，处在相对和平的环境，大批外来知识分子进入边区参加文教工作，数量上和规模上都有发展。但由于教条主义（内容上和方法上）与形式主义（作风上）作怪，日益同实际脱离，同群众需要违背。初期犹有一种活泼气氛，一九三九年后更转入沉闷与软弱无力。一方面，代表正确方面的因素被挤掉，或退居于次要地位；另一方面，客观上帮助了封建文化残余的活跃（教育方面，特别是文艺方面）。

一九四三年以后，特别是今年：开始了一个新的局面，从沉闷转向活泼，并转向大规模发展（村学，识字组，读报识字组，黑板报，秧歌等）的局面。由于生产发展，群众的文化需要提高了。更重要的，是由于整风运动，文教工作从与实际脱离，转而与之联系，知识分子从与工农隔绝，转而与之结合，因而被群众所热烈欢迎。新时期与局面，是第一时期优良作风与第二时期发展规模相结合的产物。其前途将是大规模群众文教运动的展开。

救命第一，我们大会特地把群众卫生运动放在群众文教工作的第一位，教育、报纸和文艺，都要充分反映和指导这一运动。但它在第一，第二时期是没有地位的，因为过去根本没有重视过它，这主要是官僚主义作怪（也有一点教条主义）。现在，应该是这官僚主义彻头彻尾结束的时候了。

这一切工作，现在都还在开始，但已预示了灿烂的前途。群众创造能力的闸门，被打开了，我们已经发现了不少的模范医生，模范医药组织，各卫生模范村，各模范小学与识字组，各模范黑板报，读报组，工农通讯员，模范秧歌队……。只要我们善于坚持下去，一定能在数年之后，使边区面目为之完全改观。边区将在各方面都成为全国的模范。

(三) 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为主

毛主席在大会上指示我们要组织文教战线上广泛的统一战线，不要闹孤立主义，这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敌人是百数十万群众脑子中的封建遗产，我们的建设是百数十万人的识字与健康，而我们的干部又如此缺乏，我们的物质力量也深感不足，如果没有广泛的统一战线，便不要幻想大规模群众文教运动的成功。统一战线的实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为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中间力量，向封建文化的残余进军，是为要在文化上解放群众的旧脑子，从带有若干封建残余的脑子变为完全民主的脑子。又方面，是为要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进步力量，大踏步开展新民主文化运动，是为要在文化上扩展群众的新脑子，让他们看的远一点，从今天出发，又能照顾明天。由此，两条战线斗争会在各个问题上发生，也势必发生。要反对投降封建残余的倾向，又要反对打倒一切的倾向。一般说，团结为主，从团结达到改造，达到消灭封建残余，暂时允许三字经，是为要消灭三字经，以团结中医是为要改造中医，联合“改创派秧歌”是为要发展新秧歌。

何者应团结或争取，何者应改造或批评，要从各个问题的具体性质与具体情况出发。比如中医的理论是缺乏科学的，而能治好病的药方，则未必不正确。旧秧歌的内容是封建的，调子唱“兄妹开荒”，则未必封建。报纸一般没有封建问题。所以不可一概而论，要加以具体分析。譬如关于文艺形式问题，不是抽象争论所能解决的，要看它能否表现新的内容，或能表现至何程度，凡是能够表现新内容而又为人民喜欢接受的，就要让他们发展，给以帮助。凡是不能表现新内容，或只能部份表现的，则应加以批评和改造。在群众文化战线上，即使是应该反对的东西，也不是简单的打倒。巫神及各种封建迷信是敌人，不发生联合问题；但也不是用简单打倒的方法所能解决问题的。要经过群众与本人的自觉才会被消灭。勤勤恳恳地像改造二流子一样去改造巫神，破除迷信，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与方法。

(四) 发动群众，加强领导

四项文教工作，都要发动群众，造成群众运动。群众运动必须群众路线，就群众文教运动说，必须是内容（目的）上为群众，形式（方法）上经过群众的路线。内容上应该具体实现（即根据边区当地情况的具体需要来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文教方针（即人民大众反日反封建的方针），这个问题已经明确地解决了，并且说过了。现在要说的，是形式上如何经过群众的问题，是何种方式最能为群众接受和最易普及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适当解决，同样要从边区今天的具体条件出发，今天边区还是农业为主的经济，还是地广人稀，村庄分散，劳动力不足的条件。在这种基础和这种条件之上，群众文教工作宜于分散经营，以村庄为单位，以村庄的形式出现（如村学，村的识字组，读报组，卫生组……），才为群众乐于接受，才易于普及。过去由一个或两个乡办理集中的初级小学，与上述条件不适合，即使采用了强迫办法，实际上也办不通。所以一般说来，群众文教运动的推广与普及需要采取分散的形式，主要靠群众自己觉悟与自己动手，主要靠村民自己主办。由此，提出了民办公助政策。民办公助的目的，就是经过群众自己觉悟与自己动手，也即是毛主席所说需要与自愿这两个原则的具体实现，自然，民办公助不是任何工作非如此不可，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非如此不可，而是群众文教工作特别在边区今天具体条件下的产物。

我们的民办是群众公办，是小公办，与旧社会的私办不同。我们的公办是民选政府办，是人民办，与旧社会的官办更是根本不同。小公与大公是统一的，是可以互相转变的，是不可互相脱离的，反对脱离小公的大公，也反对脱离大公的小公。所以民办必须公助，所以民办不是不要公办。

今后一个时期里，边区群众文教工作将是大量民办。大量民办需要大量公助，例如干部，课本，部份地还有经费，没有公助是不行的。特别重要的是加强领导，决不能减弱领导。领导的作用，首先在于使民办文教的内容能够符合于新民主主义的文教工作方针，既能密切联系劳动生产，联系卫生工作，并适当地适应家庭的需要，又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解放他们被封建文化残余束缚着的脑子，转向民主文化迈进。

领导的作用，在于能够发动群众的创造性，照顾民办形式的多样性，既不机械地限制他们的手足，又善于选择最可靠最能持久的形式，加以提倡。譬如经验告诉我们，在有热心积极分子为骨干，在有良好的变工队、唐将班子、合作社主持的民办文教工作，就特别可靠，特别能坚持。我们就要在群众文教战线上提倡变工与合作的方法。譬如经验又告诉我们，读报与识字结合的形式是最能起作用的形式。因为识字开眼界，读报开脑筋，两者又互相推

动。我们就要在可能条件下提倡读报识字相结合的形式。

领导民办比领导公办更要不容易，所以要加强领导，注意更复杂更细法的领导方法。

在今后边区的群众文教运动中，一方面要展开大量民办，以资普及；又方面需要小量公办，真正办好，作为民办的楷模与核心，以资提高。放弃或忽视小量公办，是不对的。但现在某些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而为群众所不满的小学（包括所谓普通小学与中心小学），必须在短时期内彻底改造为群众所满意所爱护的学校，确为群众所拥护的公立小学，不必转成民办，但不能因为要维持公办而限制民办（如限制学生转学等等）。

在民办公助的问题上，已发生了各种偏向与误解。以为民办只是解决经费（由群众出钱）问题，以为民办无需公助，或不要过问，以为民办即是废止公办等等，这是一类，还有另一类，对于民办则采取命令主义办法，所谓“官逼民办”，对于公办则强迫维持现状，不敢发动批评和实行彻底改造。前一类是放弃领导的倾向，后一类是恶劣的官僚作风，都是错误的。在今天情况之下，主要的危险还是强迫命令与惧怕批评，所以尤应努力纠正。

（五）质与量并重，反对形式主义

文教工作要不要量？要不要急？要的。在五年至十年的时间内，要求消灭百多万文盲，百分之三与百分之六十的死亡率，消灭戏剧与秧歌中的封建内容，又要求成千的村学，读报识字组，黑板报，新秧歌队与医药卫生组织。这些要求都是应该的，并不是左倾空谈。全边区干部与人民应有此决心，应作此努力。谁对此不抱着十分热心，而继续着官僚主义的冷淡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但要切记，我们要求质、量并重，而不要变了质的量；要求有步骤的急，而不要不成熟的急。要十分明白，群众文教工作的目的，是通过群众自己的觉悟，自愿地改造他们的脑筋，自愿地挤掉封建传统，自愿地接受新民主文化。毛主席指示我们，改造千百年的习惯比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这是一件非常需要说服的工作，命令主义毫无用处。这又是一件非常需要细法的工作，形式主义也同样毫无用处。

我们之间，有些同志，求成心太切，任务一经提出，恨不得马上成功，这个热情是好的，但是缺乏实际的计算，于是采取了简单命令的办法布置下去。将领导上熟了的東西，当作下级干部和群众也已熟了的東西，不加解释说服，不愿等候，因而下级干部与群众接受不了，瞒上不瞒下，数字积多，内容甚少。命令主义产生了形式主义，好心肠引起了坏结果。所谓欲速则不达，就是这个道理。

也有这样的官僚主义者，实际无知，架子十足，不调查、不研究、贪便宜、怕苦干、爱好形式，轻视内容，追求数量，忽视质量。这样，官僚主义就与形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更顽固的病症了。

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主义，在许多工作中或多或少的存在着。这是与实事求是完全相反的不良作风，大大妨碍我们对于现实的了解，大大妨碍我们工作的深入。必须随时随地警觉，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肃清之，尤其在文教工作中。

这次大会之后，各位同志回去，千万不要重复命令主义与形式主义。必须在自己机关中、团体中和村庄中，进行思想酝酿，首先在干部中和积极分子中酝酿，然后在群众中酝酿。首先搞通思想，然后商议具体办法。只要干部和大多数群众的思想搞通了，酝酿成熟

了，办法就会很快地产生出来，群众既会自愿地动作起来，新的人物，新的创造，新的成就，也会随之出现。这次大会上许多受特等奖励的同志，团体和村庄，不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吗？向他们学习——需要与自愿的原则，热情与计算的原则，艰苦与细法的作风，凭着这来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

（六）培养大批的知识分子，是开展文教运动的总关键

我们上面说的，主要是农民群众中的文教运动。但是我们还有八路军战士，工厂工人和机器学校人员的文教运动。这些方面的群众在量上比农民少得多，在质上却比农民更重要。只有把这些都组织发动起来，才是边区群众文教运动的全貌。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不来叙述这些方面已有其他同志叙述过的问题了。现在，我再谈一个总的适用于各方面的根本问题，就是：边区文教运动既然是谨次于生产运动的严重任务，既然是继续发展生产，提高边区一切工作的必要条件，那么，这个工作要靠谁来做呢？

卫生也好，教育也好，以至生产也好，决定了方针，剩下的就是要干部。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干部，在群众运动中又涌现了许多干部，但是我们的干部够了没有呢？差得远！在文教工作方面尤其差得远！我们要提高现在干部，要继续发现和培养群众中的干部，我们还要在各级学校中训练干部。这就是干部教育问题。只有解决了干部和干部教育问题以后，我们大会的各项决议才能实现，才能达到提高边区，使群众文化落后的边区，变为群众文化先进的边区之目的。所以高岗同志特别指示我们，干部教育头等重要！

高岗同志指示我们，边区一级的领导机关要负责把延安办好，分区一级的领导机关要负责把中学和地干班办好，各县的领导机关要负责把完小和区乡训练班办好，各级政府机关都要办干部文化夜校，在两三年内消灭干部中的全部文盲，这是极端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把现在的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化。尤其要为边区培养大量的足够的本地知识分子（外来知识分子是不会永远留在边区的），这是边区今后一切工作的关键，当然更是开展文教工作的关键。

我们的干部教育，一定要有明确的实际目的和适合目的的方针、制度，应该彻底抛弃教条主义内容和教条主义方法，但也要防止和反对经验主义内容和经验主义方法。除必要的政治，文化，科学与专门技能外，应该着重学习边区建设，学习边区的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尤其注意新的人生观的培养，使每个干部具有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无限热情和向人民大众学习的真正决心。这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的决定关键，又是业务成功的决定关键。这在我们这次大会上也完全得到证明。只要回忆一下大会的讨论或发言，就可以明白，谁能弯腰向着群众，鞠躬尽瘁地为着群众，虚心从群众中学习，不骄傲，不浮夸，谁便获得群众的真心爱护，谁便有创造，有成绩，有真本领，有大进步。我们应该奖励表扬这种人，我们应该教育出这种人。只要合于这些要求，无论工农分子或知识分子，我们都欢迎。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和信任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同样是边区宝贵的财产。

我们的群众文教工作和干部教育工作是这样艰巨的任务，没有各级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没有党政军民学一切的力量动员，是不能完成，甚至不能进行的。我们要求各方面的负责同志都能切实注意到这两项工作，共同来执行这次大会上毛主席和高岗同志的指示，共同来执行这次大会的各项决议。

政府和党，要把群众文教工作和干部教育工作的干部看作政治上重要的干部，边区人民，政府和党的重要干部。校长、医生、兽医、护士、助产士、编辑、记者、通讯员、读报

识字组长、秧歌队长、作家、演员，总之，一切文教工作者，只要在自己岗位上做出成绩，就是对抗战，民主和经济建设作了积极贡献，就是对革命事业尽了一定的政治责任。对他们应该给予政治上的指导，和学习的机会（参加会议，听报告，读报纸和其他出版物，在职学习和学校学习等），并应关心其物质生活，家庭生活，解决其工作上的需要，鼓励他们努力前进。

同志们，我们应该以身作则，不疲倦不自满地完成边区人民所给予我们的光荣任务！

（原载《群众》周刊，十卷二期，一九四五、二、十）

论 敌 人 后 方 文 化 工 作

梓 年

一 敌后文化工作的特殊任务

目前的文化工作，一般说来，应当以“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做它的具体内容。这对于敌人后方的文化工作，当然也事同一例。但因敌人后方自有其特殊情形，文化工作的任务，也就不能不和其他地方有所不同。

对文化工作讲来，敌后方的特殊情形是什么呢？第一，敌人的侵略战已深入我国内地，战区之广，战线之长，使它兵力不够分配与兵力分散的困难很不容易克服。同时，它在一年有半的侵略战争中已消耗了九十万万战费，现金差不多已经用光，生产力也非常疲惫。它所靠以维持生命的国外市场，又因它对中国的肆行破坏与各国抵货运动的开展，而缩小到非常狭窄。它要企图继续支持下去，一方面不得不把兵力集中在主要交通线与主要城市的扼守上，对兵力难于遍及的地方，以及它所易于统制的地方，设法造成缓冲地带，以节省兵力，同时，就在这些地方来抽收税捐，征发物品，夺取市场，吸取中国人的现金去补充侵略中国的战费。例如闽浙沿海一带，广东东江一带，它到现在还未进军占领，这原因，就在它要把这些地方，留作它广销劣货的丰厚市场。又如华北冀鲁豫有些地方，它叱使许多汉奸，蒙着“抗日”的假面具，组织“抗日自卫”武装，来拒绝真正抗日队伍的进出，这一方面固然是要用这些汉奸替它担任防御抗日军队对它的袭击，同时也是想利用他们来替它保留下大好的市场。

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坚持抗战之下，敌人已经得到一种教训，知道武力侵略完全不济，非用经济同时并进，很难长期支持。平沼上台以后，敌国资本家已喊出今后进行“中国事件”必须侧重于在中国占领区域的“经济建设”这一类的呼声。事实上，他们的所谓“经济建设”，首先就是夺取中国市场，吸收中国人民的财力。所以敌人的侵略战争，一直是，尤其在目前更是，兵轮后面跟着商轮，兵车后面跟着货车，军队后面跟着商人。这些商人队伍，大都是由做特务工作的浪人们所组成，他们用盘取豪夺的方法，到占领区的各地去推销日货。

这种情形，对我们的敌后文化工作，提出了怎样的一种特殊任务呢？第一，我们知道，浪人们拿来推销的那些日货，都是日本军阀阔，用极高的压力，从工人的工资上，工作时间内，以及一般人民日常生活的极度紧缩上，剥削得来，榨取得来的；因此，他们就可以把

那些货物，用极低廉的价格出售。第二，在离开火线稍远的敌后方同胞，民族意识与抗战情绪，很可能被苟安的心理所冲淡，所模糊；因而对价格低廉的日货，很可能贪一时的小利，糊糊涂涂的踊跃购买起来。如果我们让敌人这种经济侵略顺利进行，那在促使敌人从优势变成劣势这一战斗任务上，就要吃很大的亏。因此，我们要在这种情形之下，来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所要做的文化工作，就不能不有所特殊。为要打击敌人的经济侵略，为要使敌后方我们的广大地区与人民，不成为敌人的大好市场，我们应当要在那里造成强烈的抗税抗捐，反对征发与抵货等等运动。然光从消极方面来做这些运动是不大容易成功的，我们要进一步，发动民众武装，组织游击队，截取浪人们的货物，使那些地带对敌人不是肥美的市场，而是满涂荆棘的丛莽。

这一方面要向同胞说明敌人这些货物完全是从它国内劳苦人民那里所抢夺得来的不义之财，购买这样东西等于买赃物，帮助强盗；一方面要使同胞了解，敌人卖去货物，获得了钱财，就用去制造枪炮来屠杀我们的同胞，这等于把枪炮送给敌人来屠杀自己的同胞。另一方面，要使同胞们充分了解，中华民族是具有足够的力量战胜敌人，只要全国同胞对敌人一致采取敌对的行动；要把我前方将士与人民英勇艰辛的抗战事迹，后方人民热烈奋发支持抗战的刻苦情形，继续不断的描述给他们知道。同时要把历史上倭寇抢掠我国沿海人民的事实，与地方人民竭力抗御的壮烈史事讲给他们听，使他们知道，敌人是我们的世仇，我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比日本强盗要高贵得多，使用敌货是我们的奇耻大辱，在目前全国都用全付力量来抗战求存的今日，更是一种罪恶。这样来激发那里同胞们的敌忾同仇，来发动那里的游击战，截夺敌货的游击战。

第二，敌人在一年有半的侵略战中，已消耗了兵力七十五万以上，用到中国的兵力已达到它全部兵力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战事的前途仍是渺茫暗淡。开始的时候，敌人军队战斗力远胜于我们，我们曾经准备用三人来消耗敌军一个人。到近来，由于我战略战术的进步，由于敌人侵略战前途的暗淡，敌军纪律的败坏，士兵厌战反战情绪的增高，敌军战斗力大大降低，事实上我军一个人已可以消耗敌军一个半人左右。即使退一百步讲，我们用五个人来消耗敌军一个人，我们人多兵多，仍然还可以最后战胜敌人。所以单就人力来讲，我们无论如何，只要抗战到底，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然而，如果我们用五人所拚去敌军的一个人，不是日本兵而是伪军的中国人，那就我们太吃亏了。目前敌人正是懂得了这一层，正在用尽种种欺骗与强迫的方法，组织伪军，抽调被占区内我们的同胞来充当兵役，从多方面在进行“以华灭华”的毒计。这是我们应当极端警觉的一件事。

这一情形，对敌后的文化工作提出怎样的任务呢？那就是组织那里的同胞，发动游击队，反抗敌人强迫抽丁，争取伪军反正。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游击战，与争取伪军反正，是有密切的联带关系的。因为游击队的发展，就是证明敌人无法统治占领区域，无法利用我们的人力，这在政治上的作用，远过于军事上的作用，是争取伪军反正很大的一种推动力。我们要去组织敌后方的我们同胞，发展那里的游击战，不但要从反抗敌人强迫抽丁上去鼓动，更是要从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来鼓励抗战情绪的高涨，要用文化工作，使他们知道被敌利用，不只是苦痛。而且是绝大的耻辱，而且是抗战求存上的罪恶。

第三，敌人在我们坚持抗战的国策之下，已深深感受到诱和无望，停战不可，继续作战，能力又万难支持的苦闷，深深觉悟到过去一味烧杀淫虏的不是好办法，而转向到收买中国人的民心的所谓怀柔政策。在京沪京芜一带，我们知道，敌人把从我们仓库里抢去的米和

稻分给痛苦的当地人民，有时向当地人民采买东西的时候，故意多给价钱或把日糖日布以及药品之类，分送给当地人民。这样来欺骗我们的同胞，进行维持会等伪组织的政治侵略的阴谋。这种阴谋，大部份是不会成功的，因为这一点点小惠，是终于掩不住法西军队与大批浪人的野蛮行为与凶恶面目的。然而，不能说它完全没有作用。由于我们几千年来帝制的朝代更替，由于过去个别地方政治机构与人民的对立，由于一向民众教育的不发达，很可能有一部份人民，还抱着“不管皇帝姓李姓赵，我们小百姓反正都一样是种地纳粮，只要能让我们安定，管他是那一朝那一代！”的愚昧见解，因而就甘受敌人的欺骗与麻醉。汪精卫想向敌人那里取得“和平”，这不是明显的眼前事实？有些地方伪组织的成立，不就是具体的例证？

打击敌人的这一政治阴谋，是我们敌后文化工作最大的一个课题。

第四，敌人还在用很大的力量进行战时的文化侵略；华北的新民报与上海的新申报，就是它所竭力推销的两种大报。它把它的侵略战争，胡说为反共反蒋反国民党的战争，把我们的抗日军队胡说为南军，把我们的抗日战争，胡说为争权夺利的内战。自然，它那种报纸以及其他种种胡说八道的宣传与教育，是欺骗不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的。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前述两种报纸，发行是相当的广，多多少少是要发生一点作用的。

因此，揭破敌人那种欺骗宣传，始终是我们敌后文化工作的特殊任务之一。

要完成上述的四种文化工作上的特殊任务，就要针对着那四种情形，发扬那里同胞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描述历史上我们许多民族英雄如岳飞，如史可法，如郑成功，如洪秀全，李秀成，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等辉煌事业，讲解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与宽厚博大的文物，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卑琐浇薄，叙述目前我们抗战领袖蒋委员长的卓越，前方将士英勇壮烈的战绩，台儿庄，平型关等等的光荣胜利，说明我国地大物博的雄厚力量，友邦人士对我同情的热烈与援助的增高，与敌人日暮途穷的种种困难，这样来使大家明白中华民族的高贵，抗战的意义，国策的坚定，胜利的前途，与每一个国民的责任及其所应尽力的义务与能做的事情。但在这里最为重要的，还在于解说目前中国的统一，抗战中的各种进步现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情形，这样来使大家懂得目前第一重要的事情是全国团结，全国人民一致参加抗战，使大家懂得统一团结是我们战胜敌人最根本最伟大的力量。

二 敌后文化工作的具体方式

敌后文化工作，也和一般文化工作一样，可以有出刊物、办教育、做戏剧、歌诵、图画等文化运动的工作方式。然在敌人后方，尤其在还没有建立起抗日根据地的敌人后方，最可能，最主要的文化工作，恐怕还是出刊物。关于戏剧、歌诵、图画等等文化运动，在敌后的工作方式，和其他地方的工作方式也大同小异，似乎没有特别研究的必要，而在敌后方出刊物，办教育，尤其是出刊物，就有大不相同的地方。现在光来讲一讲出刊物。

先讲内容问题。上节所述的特殊，可以说就是敌后方所需刊物的内容的核心，刊物上的各种内容，各种材料，都要以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为鹄的。那任务，就是针对着那些特殊情形来提高同胞们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这必须用各种具体材料来使大家认识中华民族的力量，历史价值，国际地位，从而感觉到大家都应当团结一致、把法西强盗赶出去。在这里，有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这些力量，价值，地位等等，不可以使读者看来只是一种肤泛的东西，要使他们觉得所有这一些都和自己紧密的关联着。换句话说，不可以离开了当地广大人民的

实际生活行动来空泛地讲力量，价值，地位等等。敌后的刊物，当然很难说到刊行书本，只能做出报纸与期刊，主要的恐怕还是小型的报纸，这些报纸，应当有大部份的篇幅来报导，讨论，批评，当地的各种活动，与当地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各种问题。如晋西第八十八军所属的“战斗三日报”上有合理负担检查这一类文字的刊载，山西司令部所出的“新军人”上有“保护麦苗”这一类的文字，就都是很好的模范。所以刊物上的第一个内容，应当是地方新闻。这种新闻，不能只是“有闻必录”地记录一下，应当有批评，有讨论。

地图和图画，应当是一种主要的内容。记得广西学生军出的“挺进报”上有二幅以至四幅很大的地图，还有一个报纸，我已记不清名字，大约不是六一军政训处出的“新战士”，就是三十一军教导团出的“战友月刊”，每期都有两三套连环画。这都是很好的样本。这不但单是可以使读者得到明确而深刻的印象，而且对于大多数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读者们，这是最合适的刊物。

鼓励与吸收读者来投稿，是办这种报纸时要用很大的注意与力量去做到的一件事。如前引的“战友月刊”上就有不少士兵自己所写作的东西。这不只可以使报纸成为读者自己的东西，自己爱护的东西，而且可以从这里得到当地人民的真正反映，更真实更正确的反映，可以使报纸成为读者自我教育的武器。

前引的“新战士”上，有“世界援华运动”，“日人反战”，“游击战话”，“抗战问答”等等的专栏，是值得我们参考的。冀鲁青年记者团所出的“战线”旬刊，有“国际旬谈”，“十日战局”，“前线农民”，“小问答”，“小辞源”，“小常识”，“小茶棚”，等栏，更可供我们取法。我们应当在刊物上，用各种方式，切合着当地人民的需要，就看当前的实际问题，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发扬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

屯溪出版一种“前线日报”，辟有“战地通讯”一栏，这可以使前线的抗战情形，获得更灵活生动的报导。

墙头小说，可以在刊物中占一个地位。题材可以是历史上的，当今抗战中的民族英雄与光荣战迹，可以是国际上的援华运动如码头工人拒运货物商品，军用品往日本，拒卸日货，军火厂工人拒制日本所定的货品等等，可以是日本士兵与国内人民反战厌战的事实，也可以是我大后方广大人民的备战参战工作。体裁可以是短篇，也可以是章回的连载长篇，或诗词，说书，等等。

还可以采集当地所流行的歌曲，拣其适当的给以新的内容。不断的在报纸上披露。目前已经有了的许多好的救亡歌曲，当然也可以介绍上去。

其次讲一讲形式。在敌后方出刊物，是非常艰苦的工作。第一没有干部。原有的一些知识分子或文化工作者，大都多奔到自己的后方来了，留下在那里的，也不见得有这样兴趣与能力。第二没有工具，铅印的印刷机不用说是很难得到的，就是油印或石印的器具，也是并非易得的东西。他如油墨，纸张等等，都是不容易弄到的。第三，消息不灵通，不但没有通讯社供给稿件，就是通都大邑所出的抗战报纸也很难看到。要讲到刊物的形式，就不能不针对着这一些困难情形来讲。能够有铅印的刊物自然最好，能够用油印出刊物，也就很可以满足，甚至连油印也办不到，我们就应当多出壁报，使各地各村都能够看到。在那种困难情形之下办刊物，不一定每一期都有同样的东西，新闻、文艺、通讯、图书、问题研究、常识问答等等应有尽有，很可以这一期是新闻，下一期是小说，再下一期又是问题讨论。总之，时

期不宜隔得太远，最好是三日刊五日刊，宁愿里面的东西倒不拘一格，有什么写什么上去，使材料常是新鲜的，刊物也常是新鲜的。这对于读者的兴趣，工作者的情绪与工作进程的紧张是有很大大关系的。篇幅不宜太大，应当短小精干。在得到一个战事消息的时候，画了一张地图，加以生动的说明，就可以出一张壁报。某地有了一种活动或发生一种问题，把事情的开始叙述清楚，再加以批评或讨论的经过与结论或解决的办法，也就可以出一张壁报。这样，就常常可以有新的东西在打动当地人民的观听，激动他们的心情，刺戟他们的意识，而每次的量又不嫌太多，使他们“吃不消”或消化不了。这是对文化水平低下的读者比较适宜的办法。

敌后方的教育事业，到现在已是非常迫切。这不但是因为敌人已在占领疆域实施奴化教育，提供给我们一个迫切的任务（参看“新闻记者”九、十期合刊七页“我们怎样在敌人后方办报”一文），而且是为了要提高我们沦陷于敌区的同胞们的文化水平，充实他们抗战建国的力量。

在敌后办教育，当然谈不到规模与设备。祠堂，庙宇，其至茶馆，广场，树阴等等，都应当是我们的学校；春耕，秋收，抗税，抵租，都应当是我们的教材；组织自卫武装，讨论抗战工作，研究解除生活上各方面的苦痛，都应当是施行教育的机会与方式。敌后方的教育工作，决不应是离开了实际生活，贯输一些空洞，死板的所谓知识。应当就看当时所有的事件，给以比较有理论有系统的说明与解释，把理论活用到实际问题上去。譬如在公举队长或甲长保长之类的时候，可以使大家懂得一些民主政治的原理，在发动抵货运动的时候，可以使大家懂得一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在讲抗战形势或训练游击队的时候，可以使大家懂得一些我们战略战术的道理，在团结统战的问题上，可以使大家懂得一些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自学、识字班，读报组以至读书会等等的组织，小规模的训练班，短时期的补习学校以至程度较高的研究学会等等的设立，也不一定不可能，有时亦许还是必要的工作。但这与太平盛世的办法，一定是根本不相同的。也和办刊物一样，一方面要适应当时当地的需要，一方面还要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形。

最后，我们讲一讲干部问题。敌人后方的文化工作，需要从我们后方动员大量的文化工作者去发动与推动，是毫无问题的。但主要的工作人员，应当到当地去训练，提拔。从我们后方跑去的文化干部，其中心任务，不是去包办或代办那里的一切文化工作，而是要去训练出当地的文化工作者。他们一方面可以深入敌后区域去开始各种文化工作，一方面更可以依托邻近的我们队伍，招集各地的人民来开办短期的训练班或补习学校来分期培养大批的文化工作人。

敌后的文化工作是十分迫切的，同时也是十分繁重与艰苦的。一方面需要社会人士的热心勇为，一方面更需要政府有物质上的帮助与倡导；没有政府的策励，给以多方面的便利，这工作是难于开展的。要把大量工作人员送到敌人后方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于各种物资的获得，更非有政府的帮助不可。我们希望政府以及社会上有力人士，把开展敌后文化工作，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看得同样的重要，分一部份力量来赶快开始这一工作。我们相信，敌后的各种工作，尤其是游击战争与文化运动，对今后整个抗战过程的进展是具有很大的决定意义的。

（原载《群众》周刊，二卷十四期，一九三九、一、十）

目前文化工作的具体内容

潘梓年

——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

目前摆在文化工作者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际的工作问题。早已公布的抗战建国纲领，就是文化工作者目前切实的纲领，抗战建国纲领所根据的三民主义理论，就是文化工作者目前最适切的理论根据。怎样加紧抗战建国纲领的逐一实现，完全实现，如何来把三民主义的理论运用到实际问题上去，是文化工作者的迫切任务。这就是说，作为文化工作的准绳的东西是早已有了，作为文化工作者的总目标与总路线的早已确定了，问题只在于我们要怎样一步一步的走去，怎样来研究与解决沿途所遇的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

一 进步性与退步性的明确指标

固然，理论并不是教条，他是要随时随地发展开而做行动的指南的；当我们把理论运用到实际问题上去的时候，就需要研究清楚这一理论对这一问题具有着怎样的一个指示，就需要把这理论加以阐发。但在这里，却就很明显地现出一个分歧点，或是把这理论更向前推进，或是把这理论向后倒拉。这是很容易分辨清楚的，前者是愈阐发愈具体化，后者就愈推演愈难离开现实，愈抽象愈玄妙，所谓愈说愈糊涂。

为什么？因为理论是行动的方针，是解决实际上种种具体问题的利刃。如果运用理论的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那他一定是以民族——整个民族利益为利益，以广大民众的利益为利益；他所要采取的行动，决不会是为着他自己个人或和他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少数人，而是为着整个民族，也就是为着广大民众，在这里，他一定可以看到，民族利益和广大民众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不是矛盾的；因为整个民族，原来就是以广大民众为内容的，因此，他来阐发一个理论对一个问题的指示性的时候，就对事实很坦白很忠实，决不会觉得事实有什么可怕或可厌，就能对这问题求得于民众有利的解决，切实而具体的解决，这样的阐发理论，就是用具体问题来阐发，用具体问题的切实解决来阐发，使理论一天天接近于事实，一天天现实化，一天天彻底地实现出来，

要不然，他所图谋的，如果是他个人的利益或少数人的利益，那他当然就不愿使具体问题在某理论之下获得于广大民众有利的解决，相反的，他一定要想法使这理论变成帮助他来损人利己，使具体问题在这理论之下所得的解决成为牺牲广大民众的利益来满足少数人利益的方案，于是他的阐发理论，就不敢走向具体，走向现实，而要把理论从现实扯开，使他成为高深莫测，玄妙莫明的东西，因为如果一就事实来讲，立刻就要显出这种理论的不合于情理，立刻显出理论与事实的矛盾，对于他，事实是最可怕或最讨厌的东西，非竭力避开不可，这样，就非把理论愈阐发，愈使他变得离开人间遥远的东西，愈变成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东西不可。

有一个笑话，某地穷秀才走入邻近一个寺院游览，那里的势利方丈，对他理也不理，接着，来了一个显宦，方丈当然恭而敬之的献茶侍坐。秀才酸气大发，等显宦走后，上前质问方丈为何如此待人不平，他也是地方上有名人士呢，方丈连忙合什道佛法无边，即空即色，他的待秀才不敬，正是他对他的敬。这个敬的理论的阐发，可说是玄之又玄，也就是当面说逛，但是不说逛，又叫方丈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所以，同样一个黑格尔主义，在马克思手里，就阐了他的具体的一方面，使他成为革命理论的构成因素成为与现实一致的东西，成为解决历史进步的具体问题的武器；到了新黑格尔派手里，到了法西斯手里就阐发得比原来的更加玄妙，更加神秘。同样一个列宁主义，在史大林手里，阐发得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东西，成为保卫全世界和平幸福的东西，成为每一个都可从具体事实来了解是什么回事的东西，一到托洛茨基手里，就阐发得变成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帮助法西斯侵略破坏世界和平的东西，变成不能用事实来印证的东西。同样一个三民主义，在蒋委员长手里，阐发成为抗战建国纲领，成为坚持抗战到底的国策，成为全国人民都可从具体问题的解决中找出注解来的东西，一到汪精卫之流的手里，就歪曲得变成必须投降妥协的根据，变成远离事实的东西。同样的，目前中国的文化工作，因为保卫文化，发展文明的进步工作，所以所需要的理论，就是完全以事实为依归的理论，就是要使一切问题都能得到合理解决，合乎广大人民利益的解决的理论，而在敌人以及所有法西斯方面的所谓文化工作，因为是摧残文化，毁灭文明的倒退工作，所以他们的所谓文化理论就是把残杀阿比西尼亚人叫做传布欧洲文化，把吞弱小无辜的殖民地叫做合理的愿望，把在中国肆行残杀与奸淫叫做宣扬王道等等的理论，这正和方丈说不敬就是大敬一样的玄妙。

因此。在目前的中国文化工作上，如果还要阐发理论的话，那就不需要同时也不可以把三民主义的抽象一方面，玄妙化起来，而是应当在具体问题的解决这一方面来阐发，中山先生的学说，无论翻开他的三民主义演讲也好，翻开他的孙文学说以及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也好，里面原来都是充满着许多的具体问题的。

二 什么叫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

孙中山先生在他的知难行易学说上，一开头就说是要打破一般人对自己所知觉得实行非易的那种迟疑态度，就是要人家有了自己应做些什么的觉悟后，同时就要相信自己具有一定能够把要做的事做完成的力量，这就是自信心的说明。能够自信，自然就能自尊，相信抗战一定能够胜利，一定就不会觊觎无耻向敌求和，相信自己能够做一个人，就决不再会自暴自弃，同时，能够自尊，一定也就能够自信；甘心做奴隶就决不会相信自己也可做一个主人，有自尊心的革命者，决不会因一次两次的失败就失去了革命的信心。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要使中国人大家都相信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他是具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具有优良的传统，具有良好的地理，丰美的物产，具有能够成为全世界优秀民族之一的力量，他有他自己的特点，应当加以发挥；具有足以和其他优秀民族竞胜的力量，不应自斫自弃。自从甲午中东之战以后，我们这一方面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颇受斫丧，留学之风盛行一时之后，中国人就觉得什么都不如人家，就连西冷湖上的月亮也不及牛津桥畔的美丽，衣必洋服，吃必西餐，宁请西医把病治死，不信中医中也有可用的，讲到文化，就止有希腊精神好，或者说必须全部欧化，讲到民众力量，那义和团只是教匪，民众武装只是土匪。总之，中国固有的东西，一切都是要不得的，这种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的丧失，就形成了抗战

前后“恐日病”的恶症，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危机，尤其是抗战文化工作上下药时必须诊明对准的病症。

另一方面，要使中国人人人都认识自己相信自己在抗战建国的大业上，是能够发挥出一种力量来。人人都懂得自己是中国的主人，应当起来积极参加抗战建国的大业。人人有了这种自信与自尊，集合起来就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比如说，我们到乡间去宣传抗战要大家都起来参加的时候，可以得到这样的回答：“国家的军队还打不过日本鬼子，我们种地人有什么用呢！”或“那是要老爷们带领了大兵去打的，我们能做什么！”讲到地方自治，他们也会这样的回答：“我们又没念过书，一个字也不识，那能说到这些！”甚至当你劝他让儿子读书时，他也会回答你说：“这要文曲星转世的人才能读出个道理来，我们这种人家还可以这样妄想往高爬呢！”如果对他们讲讲三民主义，他会笑着说：“道理是很好很对，那里能做得到呢？”这都是没有自尊心自信心的表现，如果中国人都是这样或大多数人是这样，那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就成问题了。

但是自尊自信，和自傲自大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自傲自大的人只相信他自己一个人或左右的几个人而把自己或几个人和其余的人分别得高高在上。自信自尊，尤其是民族自信与民族自尊，不但要相信自己，同时也要相信人家，相信全民族的一切同胞都或多或少具有战胜敌人，缔造新邦的伟大力量，不但要尊重自己，同时也要人家尊重全民族的一切同胞都同样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同样有着不可侵犯的人格与人权。（那些存心要做汉奸的少数民族败类，在这里当然是不算进去的。）孙中山先生不但相信他自己，相信他的国民党能够实行他的三民主义，同时也相信共产党，相信全中国人民，都能够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所以他才联合共产党，才要唤起全国民众，召开全国民众的代表大会来共同奋斗。蒋委员长不但相信他自己，和信他的国民党党员能够坚持抗战，同时也相信共产党，相信全国人民都能坚持抗战，所以他才毅然决然停止内战领导抗战，才说抗战的堡垒是在于全国的乡村与坚固的民心。

所以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就是尊重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历史与文化，相信在这个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下，中华民族的全数儿女都有自力更生的巨力，就是重视民众，相信民众的力量。蒋委员长说在抗战当中，政治重于军事，人民重于军队，后方重于前方，这个指示，就是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的最好说明。现在仍然还有一些人只尊重自己相信自己而看不起老百姓，更信不过老百姓，说“老百姓懂得什么！靠他们能做出什么事来！”同时也看不起别人，信不过别人，以为人家始终靠不住不真诚，因而把人家看做市侩，看做权谋家甚至阴谋家，说是意在篡夺。这种人其实就连自己也没有相信得过，尊重得够，因为他不相信自己所继承到的理论主义真的会使人家诚心信奉，诚心为实现这个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因而就觉得人家是在把自己当做小孩，在欺骗自己利用自己。如果不相信人家真的在为自己所须有的主义的实现而奋斗，也不相信老百姓有实现主义的这个能力，那么，这个主义到底靠什么力量来实现呢？难道不通过全国民众一心一德的努力，那主义能够自己实现自己或者少数信徒果能把他“负之而趋”吗？这是谁也知道不可能的。那结果只有连自己也不相信，不尊重，以至于舍弃了原有的主义而采取另外一种东西来硬做。这当然非失败不可的。

以上的一些都对抗战不利，所以目前的文化工作最要紧的是要把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发扬到最高度。